

高风亮节 学人楷模

杨云涛

张秀老是老一辈革命家，我省学术界的老前辈。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不仅有光辉的革命斗争业绩和令人瞩目的政绩 而且在史学、民族学、教育学、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等学术领域里都有很高的造诣，其革命精神、道德文章素为人敬仰。今天在老人期颐之际，召开这样规模的恳谈会、讨论会，学人、长者济济一堂，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与张秀老是亲戚，是至交。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对老人的思想、人格、节操，一直十分钦仰。现就回忆所及，略述如下。

襟怀坦荡 光明磊落

张秀老在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今已有 67 年的党龄，像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健在的，在全国已经为数不多了。他在大半个世纪里，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作英勇斗争中，既经历过九年的敌人的铁窗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经历过建国后“左”的影响下三十年的冤屈生活，但他却都始终如一，精神饱满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党的伟大事业中。他这样坦荡的襟怀，光明磊落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仰！

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什么都想得通，只有一事想不通。”什么事呢？就是建国后，党的某级组织曾对他作过这样的错误决定：说他1940年至1949年十年间“有组织联系，无组织关系”，因而错误地取消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中国共产党党籍，是中国共产党党人的政治生命。他几十年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如死，他在敌人的法庭上舌战“王灵官”，英勇不屈；他出狱后在险恶的环境下，运用党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与敌人继续顽强战斗。他的这些事迹，在当时地下党里是无人不知的。我记得解放前车耀先同志，解放后程子健、张曙时、赵利群同志都对我说过：“张秀熟是千锤百炼、红心不变的好党员。”当时在成都上半节巷江东云家里，在成都中纱帽街我的家里，后来在绵阳我的家里，他经常与中共各级领导人吴玉章、罗世文、车耀先、王干清、张曙时、王朴庵等同志研究党的工作，他自己也担负着党的重要工作任务。据我所知，1940年他在省立成都师范任教时就担任中共地下组织川康特委委员，从事文教界上层统战工作。三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情况十分险恶。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郑伯克通知张老疏散隐蔽，撤离成都回平武开展工作。同年八月张老到成都找到了川康特委书记程子健汇报工作，陈令他仍回平武，组织关系仍与郑伯克联系。1942年张老接到成都共产党人王文鼎的来信，乃去成都会晤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陈予同汇报工作接受任务。陈指定组织关系与王文鼎单独联系进行工作。1947年2月中共川北第二工委书记王叙五根据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指示到平武县与张老联系布置任务。1949年春节后中共江油中心县委书记王朴庵派党员蹇到平武与张老联系研究争取平、江进步力量迎接解放工作。1949年4月22日张老在江油县城召集共产党员和各界人士100多人开会，号召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同时，1940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多次奔波平武成都之间，向党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带回党的文件、书刊过绵阳时交我妥为保管，找我通知

地下党的同志在我家里会面研究工作，张老每到绵阳王朴庵必来会面，布置研究党的工作。这怎么会是只有“组织联系”而无“组织关系”呢？对于上述这个错误决定他在思想上怎么能想得通呢？

尽管建国后“左”的环境对他排挤、压抑，以一个民主人士身份进入省级政权领导层，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努力工作，政绩突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发牢骚。他始终恪守坚信党、坚信马列主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十年动乱中，他同其他革命老前辈一样，被诬蔑、被迫害，住房被强占，连家也被抄了两次，多次受到红卫兵的勒索、干扰，每月只准发给生活费 60 元。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忍辱负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全副精力投入到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我到成都去看他时，独处斗室笑着对我说：“难得有这么清闲的读书机会啊！”他夜以继日的认真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建国以来，张秀老先后在四川和全国担任重要职务。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老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一贯要求很低。住房从 50 年代起先住在古老巷后迁学道街一个大院的旧居室里，直到 80 年代省人大宿舍修好后，大家都搬进新楼了，他才搬了家。他对我说：“不是家里人闹到要搬，我真不想搬。旧房子有什么不好。”他家的家俱，到现在还有不少是 50 年代初老人在川西区文教厅工作时，组织上分配给的。老人的衣食更是简单。他喜吃粗粮，特别爱吃平武的玉米面。一家子孙同桌进餐，顶多四菜一汤，除有客人外，从不多添菜或开小灶饭。老人在省人大工作时，每天按时上下班，风雨无改。中午大多在人大

食堂买二两饭一碟菜作午餐。吃不完的都留在饭盒里，晚餐再吃。老人有喝酒的习惯，最多不过二两白酒。从未见他醉过，下酒多为小菜、花生或油炸豌豆饼之类。

张秀老身居要职几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老人交往多，家乡的亲朋故旧更多。常有人求他介绍工作或调动工作，老人总是按组织原则办事，虽子女不例外，或婉言谢绝，或教育干工作不能三心二意，鼓励作好本职工作。有时遇到有的人一再纠缠，他就会气愤的说：“做不到！我没有那个权力”。有托老人请名书画家索要字画的，老人总是谢绝，并严正地说：“哪能随便向人家要字画！应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你知道一幅字画的价值吗？”老人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真有学识、才能的人，为了充分发挥其专长，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老人总是满腔热情地充当“伯乐”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向有关部门积极推荐。

热爱故土 竭尽绵薄

川西北山区平武县，是张老的故乡。老人的乡情是很浓厚的。他虽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时刻也未忘记家乡的建设事业。他描写故乡风物的小品《包谷》、《扁豆》描写亲情的散文《难忘父亲》以及反映家乡的巨变的纪实文章《旧地新天》……都表现了他对故园、亲人的眷恋深情。他的诗作《还乡杂咏》开头一首便是：“万山丛里古龙安，千里涪江此上源。闻道故园翻景色，归来一步一欣然。”他为家乡巨变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老人虽长期在外地工作，但与家乡各界人士一直联系密切。对于家乡人来访，虽事务羁身，工作繁忙，仍然挤出时间热情接待。只要有利于家乡建设的事，老人无一不支持的，对有请教故乡史志、解答学术疑难或要求审改诗文等等公私诸事，老人一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或当面指导，或亲复信函，都予以竭力协助解决。

他对故乡文化建设尤为关心。他说：“我自担任省级文教工作以来，支持各县创办了文教方面的不少实事，但对家乡平武县至今尚没有图书馆，深感惭愧！老人有买书、藏书、读书的嗜好，他的收入大部分是买了书。他从 1952 年起就开始向平武县捐赠图书、文物，计 1952 年捐赠楠木函线装影印《二十四史》全部、精装《鲁迅全集》一部、清末翁同和墨迹对联和山水中堂等书画；1983 年、1984 年捐赠《青年文库》等 310 册、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书画集 300 册、1987 年捐赠《四部丛刊续编》82 卷、《中华大辞典》40 卷、《辞源》、《大清统一志》、《李太白全集》等 774 册；1983 年捐赠《知不足斋》、《元曲选》等 830 余卷册。以上六次赠书近万册（卷）。这是他多年珍藏比较珍贵的版本。据我所知，每次赠书都是他不顾年老，不辞辛劳地亲自清点、包裹、交运。这种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1978 年他还提出，将他祖遗的平武南街几间房屋赠给平武县创办图书馆。可惜，老人倡导创办图书馆的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张秀老是 1985 年 90 高龄时离休的。记得 1987 年他到江油（其时已离休 2 年）。出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浓烈责任感，他应邀向当地党史、方志、文史资料人员和江油县的一些领导同志作了一整天，长达 7 个多小时的报告。他到绵阳也对绵阳上述这些部门的同志作了几次报告，推动了绵阳市及其所辖（区）这方面的工作，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他对四川文物管理和四川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为党史、地方志都倾注了大半精力。“他还为许多他熟知人物的文集写《序》。这些书序都非应酬之作，而是作了翔实的考查。下了功夫写成的，都有为文林所称道的独到见解。”

对于世人罕知的四川早期红学家孙桐生，他在 1992 年四川省政协第一次文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发掘、整理、研究孙桐生资料的倡议，省内文史资料工作者纷起响应，绵阳市研究者近年将发掘、整理、研究的成果，在北京在西南报刊上发表论文，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于 1992 年在孙桐生的家乡绵阳市举行了《红楼梦》与孙桐生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国内专家学者 40 多人到会。会上收到了学术论文 30 多篇，还发掘了孙桐生的许多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为绵阳市图书馆收藏）。中国红学会会长，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研讨会总结会议上评价说：“孙桐生是清官，爱人民的官，是进步的文艺思想家，是早期红学家、是诗人，还是地方教育家和出版家。”一位被埋没了 100 多年的学者、诗人、红学家，终于在张老倡导之下被挖掘出来，成为巴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老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最近张老在病榻上还为即将在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孙桐生研究》一书写了《序》提出对孙桐生卓有独到的见解。

马识途同志说的好：“张老所办的这些事情，并不为许多人得知。他只管埋头干去，却并不以为苦。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直到他老得卧在床上，他还在读书，还在和学术界的教授、学者谈论学术和文化……难道他真的不知老之已至吗？不，他是知道的。他青年时作为一个必死的死囚幸存下来了，他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用最后剩下的一点油膏，点燃他的生命之烛，叫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光亮和温暖。他要为他的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这就是张老的心愿。”

马识途对张老是很了解的，他对张老这一段质朴而精要的评价，的确是沁人心腑而使我们有同感的。

尊师重教的典范

——读张秀熟《二声集》有关教书育人的论述

南 治 平

张秀熟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也是我省著名的教育家。近读张老在《二声集》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倍感亲切，受益匪浅。笔者曾从事中学教学十余年，现仅就学习张老《新学年向中小学教师致敬》、《和中小学教师谈教学》两篇文章中关于教书育人的论述，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点体会。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正如张老所说：“在中小学校里，正是既要教书，又要教人”。这是张老对中小学教师思想、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李鹏总理在中国教育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也特别强调，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指示。它说明，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书育人”这个根本问题来进行。

张老认为“教书育人”首先要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教师的世界观是否得到改造 社会主义觉悟是否不断向上增长；第二、教师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生活作

风、工作作风是否一天比一天进步；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教师是否树立，是否巩固，是否坚持不渝，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文化水平，力争上游，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为人民教育事业终身奋斗；第四、教师是否感情充沛，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热爱学生，与学生休戚相关，把学生的成长和祖国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命运”。社会正在飞速进步，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这是当今时代的特征。我认为，作为教师，在不断提高自己思想素质的同时，必须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把育人问题放在首位，正确认识教学与培养人才的关系。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教师树立两个观念：

一是要有未来观。现在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造就 21 世纪的栋梁之才。教学如何去适应未来？通过学习张老有关教书育人的论述，我的体会是：1、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无论教师现在给学生多少知识，对于下个世纪的人才来说，是远远不够用的。我认为教师应该给学生以“学习的学问”正如古人云：“授人以鱼，一餐得益；授人以渔，终身得益”。达尔文也说过：“学习的学问，是最有价值的学问”。这是中外学者的经验之谈。用张老的话来说，教师“不仅要对学生‘授业’而且要对‘传道’‘解惑’”。2、要注意知识中的“育人”因素。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有数不清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医学家、发明家以及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他们都为祖国的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增添了光彩。作为教师，就要善于用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榜样和行为来影响学生，发展学生的能力，这样才称得上是“面向未来”。

二是要有全面的教育观。张老认为：教师必须竭尽全力，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全面的教育观。目前，许多教师已经在注意研究教学与德育、智育的关系，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的肤

浅认识是还应该重视“美育”，美育也包括育人的内容。通过教学，应教会学生真正的理解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懂得追求心灵、行为、语言等方面的美，摒弃一切丑恶的思想言行，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我认为这也是育人的一个重要内容。

张老认为：教师的对象是学生，要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教师必须要了解学生的特点，通过十余年的教学实践，我有如下体会：

一是当今学生的知识面扩大了。近年来，大量信息通过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传播开来，学生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不少知识。这些知识有新的、旧的、时髦的、过时的，大都对学生产生了影响。总的来说学生的视野扩大了，看问题的角度多了，不少学生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有的还产生了探究现实社会问题的愿望。我以为，这是一个优势，问题在于我们的教师能否适时地利用这个优势，对涉世不深的学生加以正确引导。

二是当今学生的思想比较复杂。目前的学生，生活在太平盛世，思想应该是好的，但当他们刚懂事的时候，就耳闻目染了不少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少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讲的正面道理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有的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鉴于此，就需要我们的老师把“育人”水平提高一些，把思想工作做得好一些。对学生要把道理说得对，然后说得好，说得透，真正说到学生的心上，让他们能够接受，也乐于接受。现在学生喜欢作横向比较，如“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如果老师光说“社会主义就是好”，道理固然对，但学生不喜欢听，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育人”的目的。教师必须根据历史的、现实的事实，把问题讲清楚，使学生易于理解，这样才真正起到了教书育人的作用。

三是学生认识的层次变化了。现在一般高中学生都开始考虑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成绩优秀的学生主要想的是升大学，往往表现为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朝着“高考目标”前进，学习以外的事很少

考虑；成绩居中的学生，一般不把高考作为唯一的目标，最容易受各种未知因素的影响；学习差的学生，对升学不抱希望，只想取得一纸文凭以谋生路。这三大类学生，都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在这方面，需要学校各部门相互配合才能解决问题。

张老说：“汉代的人也要求教师是‘经师’又是‘人师’。因此，教师负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这是新旧社会一致的，只是本质完全不同，我们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也就是说，教书育人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如何才能认真地履行这个职责，通过学习张老有关“教书育人”的论述，我的体会是：人民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必要的素质：

首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热爱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永远不要忘记教书的目的是育人。

其次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文化素质，养成专业知识素养。善于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教育学生，能应用大量的专业知识去影响学生。

再是要热爱学生，善于敏锐地观察学生的思想言行，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多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历史的、现实的信息，认识社会，以此来弥补社会经验的不足。

以上是我学习张老关于“教书育人”论述的点滴体会，未必尽合张老的本意，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张秀熟论人物传记的编写

盛 明

张秀老是我省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五四时期四川学生运动领袖，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他 1926 年入党，1928 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是四川革命史、现代史的见证人。秀老长期领导四川史志和文史资料工作，在四川人大任职期间以及离休后，九十高龄的老人，仍时常关心四川史志的编写，对研究地方史志的方向，应坚持的编写原则、研究方法以及对革命人物立传的意见，先后有多次讲话和论述。现我仅就秀老对撰写革命人物传记的论述作一简介和研讨。

一、秀老一再强调人物传记是属于写史的范围，是史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

他认为写历史总离不开人，写任何历史事物，都离不开要写人在其中的活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列宁也说过：“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②。总之，在人类历史中，人是主要因素，写史离不开人的活动，写人物就成了一项十分重要而严肃的工作。秀老说根据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写人物传记，一种是私家著述，是值得鼓励的。一种是由国家的史馆和史官编写，是公家修史，属正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119 页。

②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载《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75 页。

史的一部分，一经立传，便有如孟子所说：“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杀”，其责任之重大，由此可见。

撰写人物传记，特别是革命人物传记，秀老认为“不只要写这个人，”而是“要通过人的传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如当时的人心背向，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更要反映出当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才显得所写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党的战斗整体中的一个细胞，是一部党史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要求通过对人物及其历史环境的深入研究，展示传主的业绩和思想发展，展示时代的面貌，才能透视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给人以历史的全方位的启迪。也就要求作者把握中国革命史、党史的整体，写出革命人物的斗争和整个革命斗争的内在联系，使微观（人物传记）和宏观（历史背景）有基地结合起来，才能写好革命人物英勇奋斗的真实意义和价值。

二、秀老对撰写革命人物传记，强调必须坚持三点

第一，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人物传记，重在求实，传记作品的真实性，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原则问题，李维汉对此有过精辟的解说，他说“实事求是，一个求实，一个求是。必先求实，才能求是。求实可以叫唯物，求是就是辩证分析”^①。秀老在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二者是统一的，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必须是实事求是的”^②。实事求是也就是古人所提倡的“秉笔直书”，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秀老指出古有良史董狐、矢鱼，是秉笔直书的典范，而孔子写《春秋》就违背了这一原则，他写《春秋》定了三大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把一些历史事实篡改

^① 李维汉谈《写烈士传记的真实性问题》，在湖南党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② 引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进一步提高文史资料工作的水平》（1984年5月18日秀老在省政协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二声集》第357页。

了。秀老主张写人物就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不为尊、亲、贤所讳 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不夸大 不溢美 不缩小、不隐瞒 用史实说话 力求以真取胜。有的传记常因涂饰而失真，拨高而神化，反而有损传主形象。秀老对这种现象很反感，如有些子女为其父母立传，加入亲情成分 把父母写成完人 无限拨高 或把自己不了解的事 仅凭长辈口传，加以臆造或渲染，他认为这是有违实事求是原则的。

第二，必须充分占有资料。资料是写史写人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①。秀老认为要写好人物传，首先必须广泛搜集资料，熟悉资料，特别强调对资料的研究工作 要求通过资料的研究分析、考证核实 排比筛选 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目前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写人物在资料上不下功夫，互相抄袭，甚至道听途说也作为依据。而秀老在写人物史料上是很慎重的，他写过怀念四川马列主义先驱王右木、革命烈士袁诗尧的文章，实际上是王、袁的传略。为写王右木的怀念文章时，因资料不足 多凭记忆 以后不断广泛收集资料 反复核证 曾四易其稿。王右木是秀老的老师，也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王的生平事迹，秀老是很熟悉的。解放后，他约集了几个四川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大家根据亲身经历 反复回忆 对正见闻 写成第一稿，1954年发表于中央宣传部主编的《党史资料》。几经修改，补充 第四稿 1984年发表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特于文尾附记说明，写第一稿时“当时因事隔将近30年，但凭记忆，许多问题落了实，我心里总感觉是个缺点。20年来旁搜博访，获得了一些物证人证，反复互相核对，说明不是孤证，因加入我本人对他的直接印象 写成此篇 自信尚符合真实性原则。”秀老身体力行的实践经验说明，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对传主的主要革命事迹、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的人和事，都要有充分的了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对众说纷纭或有质疑的问题，要多调查核证。写人物传记不是资料汇集，有了可靠的材料还要有正确的观点统率材料，才能“写出科学、准确的、客观的记述”。

第三，对于人物的评价，必须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认识概述，这是秀老对撰写人物的另一重要指导思想。写人物传记必然涉及到对人物的评价、秀老主张对历史人物，绝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评价。他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是孤立的”人们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中，不能把人的好坏善恶绝对化，“好人从生下来到老死都正确，而坏的就是天生的坏人，这就脱离了历史条件来看问题，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列宁指出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人物的认识和评价，秀老强调一定要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分析和描述，绝对不能按现在政治气候的变化去加以褒贬。同时，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对人物评价，既不夸大他们当时作用，又不能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人无完人，秀老说在社会实践，有的人是某个时期很正确，某个时期又错误；就要对他好的还好的，错误的还错误的，不能坚持一点，不计其余”。只有对人物的评价公正，传才立得准。

三、秀老对撰写人物传记，除了以上三个坚持外，还提出要注意三个不同，即写人物传记不同于写资料；不同于写小说；不同于写史论。

（一）不同写于资料。资料仅仅是写史写人的原料，而写人物不是资料汇集，必须对资料进行筛选，这是针对有的人物传记，搜集的资料，不加分析研究，不加选择，全部按时间排列进去，成了事无巨细的年谱式的大事记。秀老提出写革命人物传记，主要写他的革命事迹。其他与革命无直接关系，或者虽有些关系但影响不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

大最好从略从简。他主张写人物不要搞大而全，不要都从出生写到老死，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都写进去，应该对占有的资料进行严格选择，以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做到详者当详，略者当略，这是选材时应特别注意的。这就要求写人物传记，不能罗列现象，堆积事件，而必须突出重点，就是从人物一生的真实生活、奋斗事迹中，挑选具有影响立传人物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重大活动，同时对有助于同重大事件和场合相结合，而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情节进行描写，这样才能写出传主的特点。秀老认为某人物都有共性即党性、革命性，但每个人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工作岗位和所活动的范围都各有不同，要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思想变化、精神面貌，这才能形成传主自己的特点（即个性），共性应属于个性之中，这与资料的选择和提炼，有着直接关系。

（二）不同于写小说。写小说允许艺术夸张，可以塑造出比生活原型更高大、集中的人物形象。但写人物传记，是写真人真事，重在事实，绝不允许臆造虚构，臆造使人物走样，虚构就变成了编造，就会失去信史的价值。秀老指出，写小说主要塑造典型人物，写革命人物传记，就不是设想一个典型的形象，然后再选择资料，或者资料不够，再编造一些资料来加以补充。他强调说，这是写人物的大忌。

（三）不同于写史论。秀老主张写革命人物传记，传主的功过是非，成败利钝，应该通过他的革命事迹体现出来，而不由作者在正文里加以评价。因此，他认为在写人物传记中，不要夹叙夹议，或叙一段议一段。他说按中国过去史书，传记是正文，议论是写在正文后面，如司马迁的《史记》来一个“太史公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面来一个“臣光曰”。但当前也有史论结合的人物评传，即以评论得失，着力刻画人物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贡献为纲的传记体，这已属于人物研究性的学术著作，不是以生平业绩为主的纪传。秀老所指应属后者，主张寓论于述，作者的观点不以评论形式出现，而反映在资料的取舍，褒贬寓于史实表述之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记老共产党人张秀熟

盛 明

六十年前的 1928 年 10 月 14 日，一件公开审判共产党人的案件轰动山城重庆。过去杀共产党人多是不审而杀谓之黑办。这次卫戍司令王陵基要大张旗鼓的亲自公开审讯，事前作了策划和宣传，想以此来暴露共产党，当天组织了许多人来“观审”。更多的群众是闻讯而来，都想看看反动派宣传共产党尽是些不忠不孝、十恶不赦的恶魔到底是啥模样？犯了啥大罪？卫戍司令部操场上人山人海，等到把犯人带出场，一看原来大多是文弱书生，那个为首要犯从容不迫，显得更加斯文瘦弱。

王陵基字芳舟，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一军刘湘部下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1927 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人们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煞斥称为“王灵官”。这天他高座公堂主审。历声喝问，而那位“首犯”却沉着镇静，琅声对答，言辞犀利。反而弄得主审人语塞气紧，狼狈不堪。重庆几家报纸都报导了这次审讯，《新蜀报》头版通栏标题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国民公报于 10 月 19 日至 20 日，连续刊登了《重庆共案观审录》，现摘录如下：

本报重庆十月十四日特约快讯：此间官警当局联合破获共产

党四川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各情，曾志报前，卫戍部审讯共产党详情 报章尚未报露 特将记者是日观审之种种 略记如次 以供留心该案者之参考。

王氏审讯之结果 可值吾人之注意 厥为张秀熟、池望秋、罗孝慈等数人之反志，不啻舌战王陵基。兹综记如左：王陵基问，共产党主席张秀熟答。

问：你是中央派来的吗？

答 是的。

问：你们四川的党员有若干？为什么不怕死而偏干暴动的工作？党员中组织如何？经费从何处来的？

答：党员多得很，只要把现在的旧社会制度的组织看穿了及明了列宁主义的真相的人，当然不怕死。好象中华民国为什么偏要由专制时代而变成民主政体呢？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及将来的目的，似乎也象国民党遇着满清的官吏一样。组织一层，太复杂了，可以不必说，至于经费，完全自捐，无所谓津贴。但是有时候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派的财产时，倒可以补助补助。

问：你们不是认为共产党是很对吗？真不怕死么？

答 对与不对 我们才明白 哈哈 怕死么 老实说 死与不死，算不了一回事，只要看目的能不能达到，并且我们的命，当然比不上你们的。但是孙中山先生创造中华民国，受了很多危险，牺牲了若干党员的头颅，经过好多的历程。共产党在中国，不过数年而已，将来总有实现的一天，对不住，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依样画葫芦。

王 那么 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张：死字是算我们很荣耀的事，同时不得不声明几句，须知我们所犯罪，充其量不过为主义与主义而斗争，党与党之冲突，我们既未抢人、杀人，死罪从何说起？并以中国国民党隶属下之国民政